

李立纲 编纂



马克思恩格斯
MAKESI ENGESI RENLEIXUE BIANNIANSHI

人类学
史
编年

云南民族出版社



李立纲 编纂

马克思恩格斯

MAKESI ENGESI RENLEIXUE BIANNIANSHI

人类学
编年史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 / 李立纲编纂. —昆明:
云南民族出版社, 2009. 6

ISBN 978-7-5367-3454-8

I. 马... II. 李... III. 马恩著作研究—人类学—
编年史 IV. A81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1024 号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

李立纲 编纂

责任编辑 董艾

装帧设计 杨弼睿

出版发行 云南民族出版社

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 170 号云南民族大厦五楼

邮政编码 650032

电子邮箱 ynbook@vip.163.com

印 刷 云南民族印刷厂

地 址 昆明市棕树营小区翠羽路 22 号

邮政编码 650118

开 本 889mm×1194mm 1/32

印 张 23.125

字 数 686 千

版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册

定 价 48.00 元

ISBN 978-7-5367-3454-8/A·4

序

韩 敬

李立纲同志要我为其所编纂《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写一篇序。对我来说，这实在是勉为其难。因为，虽然我平时注意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关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进展，但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并无专门的研究。只是前些年，在为一些干部和学生讲授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过程中，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塔西陀的《日耳曼尼亚志》等书，对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进行过校读，在校读中发现了一些问题，对其中文译文提出过一些意见。仅此而已。

但我还是接受了李立纲同志的邀约，愿意说上几句。因为在当前学术界马克思主义逐渐被边缘化的情况下，除了以研究马克思主义为业的学者，在其他学术领域，已经很少听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声音。李立纲同志作为一个社会学学者，在当前浮躁的学术空气下，能够不为外物所动，沉下心来，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其中有关人类学的内容系统地加以摘编，编纂了这样一本几十万字的《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实属难能可贵。何况，其书除了全面系统地反映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思想，并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提供了一个实在的基础平台以外，还有更多方面的意义。

关于马克思人类学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名称或提法，基本上是从1972年劳伦斯·克拉德以《卡尔·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为书名发表马克思晚年关于古代社会史的几个摘录笔记后才流行开来的。克拉德自己就又称呼这些笔记为“马克思的社会文化人类学笔记”。因

为根据西方学术传统，民族学也就是人类学。虽然这一学科在欧洲大陆与英、美各有不同的叫法，但其研究对象与内容大体上是相同的，即以欧洲以外的尚处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民族为主要研究对象，提供主要关于古代社会特别是原始社会的状况的材料。正是由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的这种密不可分的关联，所以关于这个学科的国际学术团体，也就名之为国际人类学和民族学学会。而马克思所摘录的那些著作，一般都可以称之为人类学著作。所以有些西方学者就以“人类学笔记”来称呼马克思的这些摘录。这样，马克思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名称或提法，也就逐渐地使用开来。特别是“人类学笔记”的称呼，甚至带上了某种时尚色彩。

然而，不管在国外还是我们国内，对这个问题都有不同意见。不少人赞成把马克思的这些摘录称之为“人类学笔记”，相应地，也不赞成关于马克思人类学、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名称或提法。一直到1996年，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在出版马克思这些笔记的单行本时，仍然用《马克思古代社会史笔记》这个外延比较宽泛、内涵包容性更广、因而更不易引起分歧，但又与《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相区别的名称，就反映了这种情况。特别是对恩格斯，即使是赞成“马克思人类学”这一称呼的人，也鲜有称呼“恩格斯人类学”的。

但是当讨论逐步展开，人们的眼光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文化人类学的狭窄范围，而是认识到这个学科已逐渐把研究范围扩展到现代民族、现代社会，并且看到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关于人的本质、人的起源、人的发展、人的解放、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民族问题等极其丰富而深刻的论述时，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名称或提法，也就开始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了。因此，李立纲同志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开始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着手编纂《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不能不说是一种得风气之先的有眼光的作为。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某些西方学者关于马克思与恩格斯对立、青年马克思与中年马克思对立、中年马克思与晚年马克思对立，并以此为据，或者赞扬马克思而反对恩格斯，或者赞扬青年马克思而反对中年马克思的观点和做法。我们并不反对对马克思的人类学

思想、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思想进行研究，也不否认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实际上，马克思的思想一生都在发展中，有时候还产生了某种质的变化。如从革命民主主义转变到科学社会主义、从人本主义转变到历史唯物主义，等等。至于某些理论观点的变化，就更多了。比如对《共产党宣言》中“至今所有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论断的修正，就是众所周知的事例。

我们所不能同意的是：

一、认为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即写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时期的马克思的思想，才能真正代表马克思主义，其中的异化观和人本主义历史观，才是马克思思想或马克思主义的精华或实质。认为手稿的发现意味着从《共产党宣言》到《资本论》时期马克思所阐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将被人的异化的历史的原理，亦即人本主义的历史观所取代。

二、认为中年马克思，即从撰写《共产党宣言》到撰写《资本论》时期的马克思，由于否定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异化观和人本主义思想，因而走上了弯路，导致了理论上的失误。或者相反，认为中年马克思与青年马克思在异化观上是一致的，异化观始终在马克思思想中占据着中心地位。这两种观点从表面上看似乎是截然相反的，但实际上在一个根本点上却是一致的，即同样都否定成熟马克思所阐明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认为晚年马克思，即写作“人类学笔记”时期的马克思，是向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立场的回归，认为晚年马克思对人类学的研究是超越甚至抛弃“仅只局限于经济学和阶级分析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亦即对中年马克思的革命的思想理论的否定。甚至认为，就此而言可以说马克思是他自己的第一个“修正主义者”。

当然，并不是所有上述观点的持有者都明确地表示了否定唯物主义历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立场，但这却是这些观点合乎逻辑的推导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这当然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事实上，不论在国外还是国内，已有不少学者针对这些观点作了辩驳。但正如科学上的任何论争一样，争论的双方，至少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是谁

也说服不了谁。其意义主要在于争取更大量的还没有形成固定观点的第三方。这里的关键，往往不在于你的文章有多么雄辩，而在于你的文章有多少事实根据。俗话说“事实胜于雄辩”，就是这个道理。

就我们当前争论的问题而言，全面阅读马克思恩格斯有关人类学的论述，当然是最好的办法。但对于绝大多数人，甚至对于大多数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人来说，通读数十卷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此，像李立纲同志编纂的《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这样依据原著、按照年代、全面系统地整理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思想的书，就十分有益也非常必要了。也就是说，李立纲同志的这本书，为我们从人类学的角度全面准确地认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理论提供了一个比较方便而又可靠的文本基础。其多方面的意义，不论是学术理论意义，还是现实实践意义，我想都是不言而喻的。

当然，我们同时也应该看到，正如李立纲同志自己已经实事求是地指出的那样，本书也只是为进一步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打下了一个基础，提供了一个台阶。而且由于是筚路蓝缕第一人，创始之功虽不可没，缺点失误却也在所难免。要使之更臻完善，要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作出更加深入、准确而有创见的研究，还需要更艰苦的努力。和已经完成的工作相比，以后的工作将不是更容易，而是更艰难。难就难在要超越自己。人们常这样说，但真正懂得这一点的人并不多。因为只有坚持不断进取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到这一点。我们希望李立纲同志不要满足于已有的成绩，而要一鼓作气地继续干下去，不断地拿出更有价值的新成果，使自己能卓然立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研究的大家之林。

（作者为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原所长，研究员）

前 言

本书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立项进行研究的重点研究项目的成果之一。

在这项研究完成之时，有必要把几个相关的问题作一个说明和交待。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就如书名所明示的，本书研究的主题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此前，也有一些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主题相关的著作面世。但“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与“马克思主义人类学”两者从概念到内容都是不一样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这一概念着重从“马克思主义”这一范畴对人类学展开研究，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并且，所讲“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就要涉及到马克思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类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以后“马克思主义”者的人类学，涉及的人将更多，时间将更长。而“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人类学）活动和思想，是就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的人类学活动和思想为线索展开研究，只限于他们两人或与他们两人有关的人类学内容；所涉及的内容，就不仅仅是传统讲的“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许多内容更要超出这一传统界限。因此，本书所讲的人类学（史），在内涵上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有比较大的突破；在时间范围上则有着严格的限定：从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至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去世）。

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虽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但前者却是后者的必要基础和前提。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就是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人类学方面所有的相关活动和思想，并把这些内容按时间顺序贯穿起来，给读者一个完整全面的马克思恩格

斯人类学的发展线索。如果没有一部全面完整的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作基础，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的研究将是困难的，其成果将是不完整的。这不仅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史）要以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活动和思想作为基本内容，其中的逻辑关系就决定了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这里还涉及到若干更重要的观点。限于篇幅，在此只谈本书编纂者一个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观点。

对于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我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认识，即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不是一种狭义的人类学（换句话说，马克思恩格斯的人类学不是西方传统的经典“文化人类学”），而是综合的人类学。因此，这种综合的人类学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晚年才产生的。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主要是马克思《人类学笔记》正式出版之前），人们还没有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或马克思人类学。在特定的场合下，马克思人类学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具有相等的意义）的概念，提到马克思人类学或马克思主义人类学，自然想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在马克思的《人类学笔记》（以下简称《笔记》）正式出版之后，人们又把《笔记》与《起源》结合起来研究，把这二者当作“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主要内容。时间至今（1999年）只有十多年（《古代社会》摘要的出版要更早一些，研究也更多一些），但却使人们看到了一个过去不曾认识的内容，一时间研究马克思人类学（不少人是以“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题目来研究这一内容的）形成热潮，因此，给人一种马克思晚年才有人类学思想的映象。再加上有的文章在马克思晚年人类学思想转向的问题上有着过多的渲染，使一些未能完整接触马克思著作的人产生误解或误读。如果将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局限于“晚年”，或从西方经典“文化人类学”的方向对此进行研究，将严重限制我们对一个伟大的关于人类问题研究宝库的认识，使我们忽略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本身所具有的重大理论价值和丰富内涵。毫无疑问，也就限制了我们对整个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认识。

现在，可以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的内涵作如下的说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人研究人类学的活动、思想

的历程。如果还要具体一些，则这种历程涉及人类的起源、人类的本质、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的发展、人类的解放，还有民族历史、民族文化、民族语言、民族政治、民族关系，以及东方问题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等等的研究。如果勉强从现代人类学分支学科的角度来说，又与哲学人类学、文化人类学、体质人类学、发展人类学、政治人类学、经济人类学、语言人类学、历史人类学等有关。“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是一个新概念（至少在我有限的所见中没有发现类似的著作），如何准确界定其外延，科学地把握其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探索。我对此多年的研究只能算是一个最初浅的探索。这种探索是否妥当，还需要社会的检验，还赖有识之士的评论和指教。

书名中不是“马克思人类学”而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问题。这种两人合传的必要性何在？从马克思与恩格斯结识，到马克思去世，在这40年多一点的历史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就为着共同的理想而求索、奋斗。他们的许多重要著作是联名发表的，他们的思想往往异常接近甚至相似，而且马克思去世后，恩格斯还花巨大的精力整理马克思的遗著（主要是《资本论》第二、第三卷），完成着马克思的未竟事业。他们两人的名字，由他们的友谊和事业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就人类学这一主题的研究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在不同时期各有一定的侧重，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研究又往往是相互呼应、相辅相成的，经常是为了一个共同的内容而分别进行研究（如一个著名的事例：马克思作《古代社会》一书摘要，恩格斯又在此基础上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在他们相互往来的书信中，有着大量的人类学问题的讨论。把他们两人的名字连在一起，是对他们共同研究人类学事实的确认。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研究计划。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就我来说，工作计划大体可以分为三期：第一期，通读《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同时研读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传记材料、研究资料等，并作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笔记和主题索引；第二期，在此基础上编纂《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第三期，撰写《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三期是三个步骤，三个步骤一步比一步深入，但

是否也是一步比一步更艰难呢？从打下基础理出头绪明确思路提出观点来说，却不见得。第一步是最为艰难的。从打下研究基础和理出研究头绪并掌握线索来说，第一步是难中之难。首先，研读 50 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仅量多，而且以其无与伦比的深邃、博大精深，撼动（同时也是吸引）着每一个试图读它的人。没有足够的耐心和毅力，无法坚持下去。我深感有一种巨大的动力和责任感在驱动着我，要读完它，并力求读懂它；其次，读此书不是一个单纯的“读”。读的过程中就有理论整体的把握，就有基本观点的确立，就有编纂思路的定位，决不是一读了之。不然的话怎样进入第二步、第三步？第二步的艰难程度明显小于第一步，但又比第三步难。第二步的工作是什么？就是全面彻底系统地梳理出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内容，完整地编纂一部“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目前读者面前的这部书就是我第二步工作的一个成果。有了这样一部编年史，撰写“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的工作就不仅有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更重要的是有了一个基本的框架，思路明确，线索清楚，观点则融化在整个系统中。第三步的工作，则是在第一步和第二步工作的基础上，细致严谨地撰写一部《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第三步的工作虽说不比第一步和第二步难，但却需要更多的耐心和细致，以及根据新的资料（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中的新资料和新译文）进行调整补充修正。今后，在可能的情况下，在《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以及《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的基础上，将进一步撰写出《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通论》这样的著作。当然这是后话。

关于编年体的运用。编年体史书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先秦时期编年体在历史著作编撰方面占有主导地位。我国最早的一部具有编年体意义的史书就是孔子编撰的《春秋》。在春秋三传中，《公羊传》和《穀梁传》是以阐释《春秋》之微言大义为己任的作品，而《左传》则是真正的史传，它依年编定，铺陈史事。如果说《春秋》还是一部政治意义大于史学价值的经典的话，《左传》就更专重于史实之叙述，所以史学界将其尊为编年体史书之宗。《竹书纪年》也是一部编年体史书。以后还有《汉纪》、《后汉纪》、《资治通鉴》、

《续资治通鉴》等，这些都是著名的编年体史书。编年体史书能做到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按照年、月、日的前后顺序，记载有关的史事。时间是其编史中心线索。通过阅读这种史书，能够使人清晰准确地掌握某一事件的时间定位，或者是便于从某一时间位置上了解到相应的史实。尤其便于在已知时间条件下查阅相关史实。这是编年体史书的突出的优点。但编年体史书的缺点也是明显的，主要就是同一历史事件因其有一个发展过程而往往被安排在若干时间点上，有时看不出同一事件之间的关系，不易对事件的整体把握。一事件若相延时间较长，或两件以上的事件交替展开时，不易掌握其进展脉络。对于这种不足，也可以作一定程度的变通，在具体操作过程中采取某些方法来处理，以充分突出编年体史书的优点，缩小其局限性。古人在这方面也有一些值得今人仿效的地方。历史上就有现成的例子。如《汉纪》、《后汉纪》这两部断代编年体史书，运用“连类例举”的方法，即人物“言行趣舍，各以类书”，不但便于事件的查找，也扩大了编年体史书的容量。宋代编年体史书还进一步有所改进，如在史书中运用了追叙法、预叙法和类叙法。这样，就在解决同一事件但分布在不同时间点上，又要照顾“编年”这一根本要求的矛盾方面有了突破。这在《资治通鉴》中有较好的运用。

中国历史编纂学，两千多年来经验丰富，成就斐然。纪传、编年、会要、会典、纪事本末等是历史编纂中的主要方法。

本书以编年为主，间用会要，掺以纪传（类人物学术传）、纪事本末（即如本书中的许多专题）的方法，成为一种略具一格的“新体”史书，也可以说是一种形式上古今结合的作品吧。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的特点。《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既继承了传统编年体史书的优点，又适应时代的要求，同时结合本书主题的内在特性，形成自己的特点。这些特点主要是：一、编年形式。严格按照年、月、日的时间先后顺序，逐项安排史料，最终形成一部完整建立在时间序列之上的专题著作；二、传记性质。本书虽然不叫《某某传》，但又有传记的特点。传主即马克思和恩格斯。但又不是一般的人物传记，从性质上来说是一种思想和活动

合一的传记，从形式上来说是一种编年体的传记；三、这种思想和活动合一的内容也就是主题即“人类学”。因此，本书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人类学思想和活动为主题的编年史；四、因此本书是一部专题性很强而内容又相当广泛的编年体史书。围绕人类学这一主题，凡马克思恩格斯两人一生与此有关的活动、著述、思考，包括札记、通信、谈话、争论、交往、考察、演讲、出版等等，都已经涉及到。

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编年史》的一些具体做法。为了既突出历史著作叙事的性质（延续性），又尽量避免编年体带来的局限性（事件延续性的中断），也为了体现本书的特点，本书在编纂过程中的一些具体做法是：

第一，整个“编年史”时间起止，从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起至1895年8月5日恩格斯去世止，共77年又3个月。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各种思想和活动的史实即在这一期间展开。

第二，本书严格按照“人类学”这一主题来安排材料，力求每一条材料都做到体现这一主题。但要说明的是，这当中也有少数“例外”。如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出生和去世，虽然并不是直接的人类学的内容，但在本书中这种材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自不待言，这种“例外”的必要性每一个读者都是会理解的。这也是本书传记性质的一种体现。又如，“马克思与恩格斯第一次见面”（1842年11月下半月），也安排了一条。两位伟人的见面，对于以后两人在人类学方面的合作、相互启发和独特的贡献都有着特殊的意义。

第三，全书体现完整性、系统性和全面性。凡与人类学有关材料，均应列入其中。包括那些传主明显是失误的做法和说法，也不回避。这既是这一专题史的需要（作为一种特定的历史，有意地抹去某些对传主“不利的”材料，这对历史是一种欺骗），也是对一个编史者的职责修养所要求的。没有史德不能作史。本书中有许多这样的材料，如恩格斯关于斯拉夫人的某些不妥当的说法，如说“波兰人是毫无希望的民族”、“捷克民族是一个垂死的民族”、“从来没有自己的历史的民族是没有生命力的，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什么独立的”。恩格斯还根据当时不同的民族运动在革命中的不同态度，某一

民族运动客观上为哪一个势力服务，而把他们分为“革命”的民族和“反革命”的民族。这样的材料也不应该有意“遗漏”。

第四，关于体现同一史事的连续性，克服编年体带来的局限性的问题。

分三种情况来处理：

一种是追叙法。即在叙述本事时追叙前事。如1884年2月5日恩格斯致信拉甫罗夫，信中谈到自己正在整理马克思遗留下来的书籍问题。由于上一封信〔见“恩格斯谈马克思留下的俄文书籍（1884年1月28日）”条〕涉及同一件事情，本条也就追述到前事即1884年1月28日之信。

一种是预叙法。即在叙述本事时预述后事。如1853年5月26日恩格斯致信马克思，信中谈到阿拉伯人问题。本事中预叙后事，即1853年6月2日马克思致信恩格斯，再次谈到阿拉伯人问题。

追叙法和预叙法使用得不多。

使用得较多的是类叙法。类叙法就是把虽然不在同一时间点上而又是相关的事情集中在一起叙述。如在“马克思写关于印度问题的一系列文章”这一条中，集中叙述了马克思为《纽约每日论坛报》写的11篇有关印度问题的文章的情况，时间从1853年的6月10日到9月20日。又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国际述评》”，所写的“述评”共有3篇，时间从1850年的1月31日到11月1日。该条把这3篇述评放在一起进行叙述。此种方法的运用，也就是上文所说的本书掺有“纪事本末”的一个实例。

第五，本书所反映的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马克思恩格斯的活动（交往、阅读、写作、翻译、出版、校对以及其他活动）；一类是他们的言论和著述（包括著述、通信、札记、谈话、演说的内容等）。对于后者，如何在编年史中反映出来呢？我采取三种方法，一种是引述，一种是概述。另外还有一些著作没有引述也没有概述，而是采取专题介绍的形式。引述和概述都比较好理解。为什么要采取专题介绍的形式？有两点原因。这两点原因是根据这些著作的两种类型来分别对待的。第一点，根据第一种类型，这些著作已经是

专门的或较为专门的人类学论著，这类著作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起源》第四版序言、《论早期基督教的历史》、《论古代日耳曼人的历史》、《法兰克时代》、《马尔克》等。这类著作因为其人类学的专门性，引述或概述都会使篇幅变得很大，所以采取专题介绍的形式。第二点，根据第二种类型，这种类型的著作主要是札记、笔记、摘要等。这种类型的著作往往是马克思恩格斯引述原作者的话，再加上自己的评语，有时是重新把原书的结构、编排次序作了调整。即使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加有自己的话的地方，他们的话也不多，并且相当分散，往往不系统。还有的时候是作了一些标记，或划上了一些线条、符号等，这些线条和符号本身也是有一定意义的。这些情况都不便于引述和概述。所以也采取了专题介绍的形式。这类著作有：《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约翰·菲尔爵士〈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从美国革命到1801年合并的爱尔兰〉摘录和札记》、《高德文·斯密斯〈爱尔兰历史和爱尔兰性格〉一书札记》、《有关爱尔兰没收土地历史的材料》等。

最后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需要在此略为交待一下。

一是所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版本问题。本书编纂所依据的内容，主要来源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现在（2004年）已经陆续在出版该全集的中文新译第二版。但第二版离全部出版完成还需相当一段时间。为了本书的完整和一贯性，目前我只能依据第一版来做这项工作。根据新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对此书进行全面的修订，是第二版全部出版以后肯定要做的一件事情。

二是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外，编纂中还大量参考了其他版本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单行本、马克思恩格斯的传记资料、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各种著作。在此不一一例出。可参阅书后“主要参考文献”。

三是本书没有涉及《马克思历史学笔记》的内容。

四是本书完成于1999年7月份。本书如能按时出版，则是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献礼的礼物（当时也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廿周年的纪念日）。因此，当年本书打印稿扉页上印上了如下的字样：

谨向——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五十周年献礼

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建院廿周年献礼

今天，我无奈地将这几行字画去了。

五是本人在编纂此书过程中，曾写过3篇相关的文章：《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初读》、《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的前期过程》、《关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史”研究》。这3篇文章都只在内部刊印过。因流传范围很窄，常常碰到有人来索要。这3篇文章涉及“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概念、至今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以及“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的研究状况、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意义、研究“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的困难等几个方面。上述3篇文章对于理解“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这一主题，以及了解本书有一定的参考作用。这3篇文章中的一些重要观点和内容，本文（即“前言”）其实也已经有所涉及。现以“前言”的形式将某些观点和认识发表出来，供参考。

六是“马克思恩格斯人类学”内容十分丰富，体系十分庞大，而对其研究又处于一个艰难的开启过程之中，本书仅只是一个初步的探索性的研究成果。对这样一个内容丰富、体系庞大的课题的研究，需要大量有识之士长期艰苦的努力。因此，本书编纂方法和观点仅是一家之言。不论是草创之功，还是引玉之砖，都由人们来评说。我真诚希望能听到对本书的同样真诚的意见和批评。

李立纲

1999年5月27日初稿于昆明金马寺寓所

2004年8月25日修改定稿于昆明气象路寓所

目 录

马克思出生（1818年5月5日）	（1）
恩格斯出生（1820年11月28日）	（1）
马克思写作论宗教问题的作文（1835年8月10日）	（1）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从自己身上解脱迷信的枷锁 （1835年8月10日）	（2）
马克思论人的社会活动目标（1835年8月12日）	（3）
马克思在大学时期修人类学课程（1836年~1837年）	（3）
马克思作《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1839年）	（3）
恩格斯评《德国民间故事书》（1839年秋）	（4）
恩格斯论历史运行规律（1839年11月~1840年1月）	（5）
马克思写作博士论文（1840年下半年~1841年3月）	（6）
马克思论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哲学宇宙观 （1840年下半年~1841年3月）	（7）
恩格斯论《马赛曲》超越民族界限而为全人类所接受 （1840年12月）	（9）
恩格斯论低地德意志方言（1841年1月）	（9）
马克思参加《对黑格尔、无神论者的反基督教者的末日的宣告》 的写作（1841年8月~9月）	（10）
马克思和鲍威尔准备写一本关于黑格尔的著作 （1841年9月~1842年2月）	（10）
马克思继续研究宗教史和艺术史（1842年3月初）	（10）
恩格斯写《北德意志自由主义和南德意志自由主义》 （1842年3月）	（11）
马克思写作《论宗教的艺术》等文章（1842年3月~5月）	